

哲学史方法论学习札记

郭 齐 勇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是异常丰富的、发展着的体系。本文不拟全面地论述这一层次复杂的系统,而仅就其中的若干原则和方法,对于研究哲学史上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相互关系的指导意义谈点浅见。

延续性与非延续性

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无论是西方、印度还是中国的,我们都能从极其混乱的史实中找到其前后相继的线索。任何时代的哲学家毫无例外地都要从先行的思想资料出发,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课题或研究方法。与这种延续性同时并存的是哲学史上出现的另一现象——非延续性。每到一定阶段,总有人出来怀疑甚至推翻前人的成果,变更其课题,否定其方法,开创哲学的新生面。以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论,典型的就有魏晋玄学代替两汉经学、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批判宋明道学等等。著名学者汤用彤认为,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以玄学取代经学,中国哲学之主题和运思方式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宇宙构成论发展而为本体论,中国人的抽象能力和思辨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肇始于严遵、扬雄、桓谭、王充,他们发动反传统之净化运动,“极力排除主流思潮之荒诞繁琐与不合理,而成为促进主流学术思想变动之势力。”^①

与上面两种历史现象相应的,有下述两种历史理论: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为说明哲学发展史上的延续性、累积性或肯定式的继承性提供了方便。它善于从纷然杂陈的思潮、流派和哲学体系的外表底下找出其内在联系,从而把整个哲学史看成是首尾连贯的因果系列。黑格尔并非不讲哲学史上的变革、否定和渐进性之中断,然而针对着他以前的形而上学哲学史家把哲学史看成彼此反对、相互推翻的“纷歧意见之堆积”和“不断地全部更新和变化的戏剧”的错误,他不能不过份强调哲学史上的范畴、命题、体系、方法的同一性和继承性。诚如一位苏联学者所指出的,黑格尔“提到第一位的是范畴的继承性和范畴的和解式的‘扬弃’,而不是一些学说‘扬弃地’推翻另一些学说。”^②他不容忍哲学体系之间的悲剧式的斗争、不可调和的对立和相互易位,因为他所恪守的原则是哲学体系的历史连贯性必须服从于辩证逻辑范畴的连续性。按照这一原则,后来的哲学必定高于先前的哲学,这当然是违背史实的。汉代哲学决不高于先秦,即在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史》中,中世纪哲学并不高于希腊罗马,伊壁鸠鲁远逊于亚里士多德。

如果我们撇开哲学史与科学史的区别,只是从元方法论的角度比较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库恩的科学史观,不难看出二者的殊趣。针对逻辑实证论和波普各自的偏颇,历史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库恩,既承认科学发展中的一般的累积的过程(常规科学),又承认科学史上打破传统的非累积的发展阶段(科学革命),二者互相渗透和补充。然而他却过份强调了新旧理论、范式之间的不可比、不相容的一面,否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库恩指出,“每一次革命都迫使

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变更原来所遵循的原则和思维方式，甚至彻底改变科学的形象，“科学革命在这里被当作是那些非积累的发展事件，在其中，一套较陈旧的规范全部或局部被一套新的不相容的规范所代替。”^⑤库恩的弊病是：抬高了质的间断而贬低了量的积累，明确了阶段而忽视了连续，有见于否定式的继承无见于肯定式的继承。还有一些历史哲学家比库恩走得更远。他们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异质性与同质性割裂开来，提出所谓“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的原理”，明确否定历史连续性的原则，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结构主义者密歇尔·福柯就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所开辟的认识道路，提供了正确解决哲学史上的累积与革命、延续与非延续之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前提。

首先，经典作家高度赞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力图把哲学史看成有机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千差万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同时批评它没有着重强调哲学体系之间的否定和斗争。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把真正对立面的尖锐性以及这些对立面的转化为极端看做有害的、必须尽可能加以阻止的事情”。^④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法哲学的这些话，完全适用于黑格尔的哲学史。^⑥黑格尔在哲学史中对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抹杀和贬低，除了哲学党性使然，亦与这种强调延续性忽视本质的矛盾的原则不无关系。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纠正了其哲学史观的这个偏颇。在《逻辑学》中，他把非连续性和连续性一样，也看作是量的环节，并且批评康德没有把这两个规定统一起来。列宁赞誉这个思想是“真正的辩证法”。^⑦

其次，经典作家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时，非常重视不同时期哲学家集团之间在哲学倾向、思维模式上的区别与联系，既从它们的相互否定中把握其肯定的方面，又从它们的延续和统一中把握其本质的、足以划分哲学发展阶段的差别。他们把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划分为相互联结的朴素的、机械的、辩证的三大阶段；他们高度评价了可以与科学史上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革命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作用，都为大家所熟知。事实上，德国的这群思辨哲学家尽管在哲学倾向、研究对象、思维方式乃至写作风格和社会作用等方面，与法国百科全书派迥然离异，然而，如果没有继承洛克唯物主义传统的法国哲学彻底摧毁神学殿堂，奠定了科学认识论的前提，德国古典哲学就不可能公开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在认识论诸问题上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它们之间既是延续的，又是非延续的。

哲学史上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对立”；还说明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与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在民族形式上的差异，及其与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联系。^⑧普列汉诺夫继续了这个研究。他补充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继承着百科全书派，可是在社会组织和对宗教的态度上却与后者“对着干”起来。他认为，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肯定的或者否定的联系，“或者追随着自己的先辈们的足迹，发展他们的思想，采用他们的手法，而只允许自己和它‘竞争’，或者它们起来反对旧的和手法，和他们发生矛盾。”^⑨总之，在哲学史研究中，抹杀质的飞跃和阶段性的变革，显然是错误的；看不到量的积累和理论上的渊源，也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统一的原理，是从哲学史辩证发展的实际中抽绎出来的，它同时又是一条治史的重要方法，有待我们结合实际加以运用和发挥，并通过总结历史上理论思维的教训，防止各种直线性和片面性。它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至少具有下述意义：

第一、促进对于哲学变革的研究。我们对哲学史上的若干转折、革命或部分质变的发生、发展及其特殊意义的研究是极为不够的。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⑨ 哲学史既然是认识史，就应当以理论思维的内容和形式的变革作为划分限断的标准。我以为，封建社会以前的哲学阶段，可以汲取原始思维、发生认识论的研究成果，予以重新厘定；封建社会期间的哲学，则应注意主流与非主流、反主流的分化、斗争和融和。例如，具有发散式思维特征的玄学是如何勃兴的，它与具有收敛式思维特征的经学是如何对立着的，本末、有无、体用、才性等范畴取代天人、名实、古今、礼法的认识论意义等，非常值得探讨。有的哲学史家已经重视了殷周之际、秦汉之际、唐末、明末、清末等冲破樊篱的批判思潮和哲学革命，如在中国哲学通史中将明末清初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反道学思潮别为一编，集中阐扬。^⑩ 从万历到乾隆，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与市民文学相呼应，出现了浩大的早期哲学启蒙运动，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封建制度及其统治思想进行“自我批判”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哲学的内容、形式也发生了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至于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变革，特别是对“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反对封建意识的社会作用，我们的研究太粗、估价太低。

第二、便于清理思潮、流派之间的关系。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统一的原理，不仅可以使我们自觉把握理论思维发展的节奏，而且有助于从质量变化的关节点出发，清理错综复杂的诸种关系。汤先生将思维规范相近的汉代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作为相互对立的唯心主义的繁琐经学与唯心主义的思辨玄学、哲学宇宙论与本体论之间的过渡环节，正确地说明了三大思潮之间的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对立之中有联系，联系之中有对立。例如关于王阳明与朱熹的关系，一位日本学者就没有简单地把它仅仅看成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王阳明并不是从陆象山而是从朱熹出发的，只是当阳明认定朱子格物致知行不通时，才彻底实现了由外向内的转折，以致使得包括朱学在内的整个宋学，这个以主体的思想意识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最终完善化、纯粹化了。^⑪ 足见朱王两个学术流派之间，既是延续的又是非延续的。此外，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与宋明道学、与中世纪异端（如王学左派）、与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是复杂的尚待清理的问题。但基本的线条是清楚的：顾、黄、王、方等入宋明道学又出宋明道学；如果没有左派王学把宋明道学的弊端彻底暴露出来，他们就不可能从哲学路线、理论内容和思维逻辑上进行较深入的批判；而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从一定意义上则可以看着是他们的自然延伸。

第三、深入探讨“哲学共同体”。研究哲学史上既间断又延续的发展逻辑，不能不重视哲学家集团的问题。现行中国哲学通史著作的缺憾之一，就是没有把一个个哲学家放到思潮、流派、文化区域、师承关系上加以考察。近来已有哲学史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任继愈把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区别为邹鲁、荆楚、三晋、燕齐四个类型。由于地区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同一时代的哲学探讨的内容和方法各各不一。^⑫ 笔者以为，三十多年来，我国哲学史界忽视了整理、提炼、消化和吸收我们民族自己的思想史论的方法论。黄宗羲师徒父子合作的鸿篇巨制《宋元学案》，十分“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之关系多作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的相互影响。”^⑬ 该著与《明儒学案》和孙奇逢《理学宗传》等一样，将散殊之百家“分源别派”，从“相反之论”、“一偏之见”中把握“数百年之学脉”。这就有了延续与非延续一致的思想萌芽。我们决不是要回到封建史家那里去，而是主张通过对一个个哲学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的把握，深入理解同一或不同历史地层各具特色的逻辑范畴和理论思维模式的多样性、丰富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

黑格尔认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偶然性必须于进入哲学领域时立即排除掉。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⑭他有时显然把这种必然性强调得过了头，认为理念展开出来的形式或范畴的多样性统统都是必然的、有规定的。^⑮但是，黑格尔毕竟是具有伟大历史感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并没有把充满偶然性的、斑斓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枯乏味的陈年老账。他在《小逻辑》里又说，不能完全排斥偶然，作为理念扬弃了的一个环节，“偶然性在精神世界也有其相当地位……任何科学的研究，如果太片面地采取排斥偶然性、单求必然性的趋向，将不免受到空疏的‘把戏’和‘固执的学究气’的正当的讥评。”^⑯黑格尔第一次把世界史和哲学史看成“发展中的系统”，以颠倒的形式从偶然的史实中揭示了历史和哲学发展的必然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准备了思想前提。

必然与偶然，是历史科学的极其重要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精辟地论证了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偶然性始终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⑰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必然性“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⑱。哲学发展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根源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在生产方式与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其间主要的中间环节就有：经济关系、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社会心理、低级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等）、高级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等）。^⑲另一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⑳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偶然性对于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重大作用，同时指出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远不是无足轻重的。

忽视创造历史的主体活动和各种复杂因素，势必把必然性神秘化而堕入宿命论的泥潭。反之，把偶然与必然对立起来，夸大偶然事件的作用，或者把个别、特殊与普遍对立起来，将历史科学局限于个别与特殊的研究，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势必导致反科学的非决定论的谬误，如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迈纳克、卡尔·雅斯贝斯、梅罗-庞蒂、阿伦·尼文斯等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样。他们认为历史学是个性记述的科学，人类历史不过是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之堆积，因而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我们认为：社会意识被决定于、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根本论纲，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哲学派别斗争具有党性的基本原则，哲学认识在对立斗争中的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重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史特别是哲学发展史所作的科学抽象，已经并且继续为实践所证明。只有遵循这样一些普遍规律前进，哲学史研究才能走上科学化的坦途。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影响，我国哲学史界的主要问题是善于消化和发展这些理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偶然与必然（也即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个别、特殊与普遍）相统一的原理在当前我国哲学史研究中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应当处理好一些什么关系呢？

第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去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忽视偶然、忽视同中之异、忽视多样性、个体性、特殊性，就是不懂得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具体的、历

史的统一。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通过对无限多样的个别、偶然的哲学史现象的具体研究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更为重要的是由普遍通过特殊回到个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的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联结。无个性就无共性，丢掉了个别，把普遍绝对化，就会使得纷繁复杂的哲学体系和千差万别的历史人物的统一性变得无法认识；同样的，丢掉了普遍，把多样性绝对化，就会导致对于哲学史的性质及其辩证发展毫无所知。⑥我们应当以一般为指导，狠抓“特殊”这个中间环节，通过对于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的哲学史现象的研究，找出其特殊本质及其与共同本质的关系，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有的论者早已指出：既不能把历史科学的具体性理解为拒绝科学抽象、排斥研究和揭示普遍规律，理解为经验主义地现象罗列；又不能把历史科学的统一性从多样性中孤立起来。强调必然“丝毫不排斥对庞杂纷繁的历史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综合，揭示出这些具体历史过程的特殊矛盾、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我们应当“力求以具体的形式把历史的具体再现出来，也就是按具体历史过程所固有的丰富性、特殊性、偶然性、曲折性而又服从于内在的必然规律这一特点把它再现出来。”⑦

第二、社会心理与个性特征。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经过职业哲学家加工制作了的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在思想体系与社会存在之间横亘着极富有弹性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有的研究者把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一重要范畴概括为：特定时期特定民族广大群众，或特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中间普遍流行的没有经过系统加工的精神状况，包括他们的理想、要求、愿望、情感、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等。⑧普氏认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⑨撇开社会心理去谈代表人物的典型思想（一般又沿用四大块的分割），就会使得不同历史地层的理论思维乃至语言格调总是似曾相识。哲学家个人的特征也是不能忽视的。在哲学史研究中排斥个人的天赋、气质、性格、教养、经历、知识结构等等偶然因素，就无法说明为什么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哲学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和思辨结构，例如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贺麟与熊十力的差异等等。

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和补充，忽略了偶然性的作用，当然会造成重大的方法论的错误。就拿玄学来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没有肮脏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没有放达的建安文学的影响，没有王、何、嵇、阮、支道林等玄学家的个人气质，决不可能振起玄风，也不可能把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提到时代所允许的高度。玄学取代经学，既疑经又卫道之宋学取代汉学，以及宋学的瓦解等等，都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而这种必然正是无数偶然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的结果。至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哲学逻辑发展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花费气力研究的课题。三世纪开始的佛教传入、十七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其传播过程、传播者本身、各种学说的影响和作用、中国的思想土壤和外来文化之能否及怎样中国化，都有着非常复杂的情形。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不待说了，佛学与玄学、宋明道学、清末志士的关系，耶稣会士对于明清思想界、科技界的影响，叔本华、尼采哲学对于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的并非完全消极的作用，如此等等，均需清理。

第三、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在逻辑中思想史和思维规律相吻合。研究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及其辩证联结，对于掌握我们民族的思维规律的重大意义，越来越被更多的研究者所重视。这种研究唯一适用的方式即是逻辑的研究方式，以摆脱“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

偶然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这就指出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纽带，而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或那种范畴，中、西、印逻辑范畴为什么差异极大，中国哲学范畴为什么认同性弱、适应性强等，是不能单用逻辑的方法，单单考虑理性因素而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普列汉诺夫说，单单用逻辑的方式来说明哲学史的发展，顶多只有部分的真理，因为它无法揭示哲学知识进化受社会生活各方面制约的根本原因，也完全不能说明诸如哲学体系的过渡为什么有时很快有时却要整整一个世纪等复杂的问题。^③逻辑方法必须与历史方法相结合，否则，什么东西都说明不了，如章太炎一生学术思想凡数变，单用逻辑范畴无法说明其原因。逻辑与历史一致性原则是对二者不一致的扬弃。只有象马克思那样，对于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了如指掌，对于什么是历史的偶然的外在的因素，什么是历史的内在必然的趋势，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才能正确地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也才能够把哲学史研究中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一九八三年四月初稿，十二月修订。

注释：

- ① 汤用彤：《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 ② 〔苏〕奥伊则尔曼主编：《辩证法史》，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334页。
- ③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中译本第5、76页。
- ④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8、356页；第2卷第165—170页。
- ⑤ 〔苏〕奥伊则尔曼：《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2、3期。
- ⑥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9页。
- ⑧④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4页、第2卷第272—273页、第1卷第475页。
- ⑨⑩⑪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第4卷第243、506、393页、第2卷第122页。
- ⑭ 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及萧蓬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卷。
- ⑮ 〔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笔者所见为蒋国保同志的译稿。
- ⑯ 任继愈：《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区性》，载《中华学术论文集》。
- ⑰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⑱⑲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新1版，第1卷第40、38页。
- ⑳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303页。
- ㉑⑳ 王荫庭：《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 ㉒ 参见丁伟志：《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 ㉓ 萧蓬父：《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载《哲学研究》1964年第3期。